

刘先生是大学一年级时给我们讲古典文学的。如同我们很久没有在教室里端坐过,他应该也很久没有站在讲台上了。早过了退休年龄,眼睛里已是老人般光晕,可是课讲得好啊!

一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大大的教室里,他讲《左传》《战国策》,窗外是盛开的栀子花。

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大学生,听着一个老先生讲这些很久前的文学和历史,并没有什么比较,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课!他是一个大学先生!

他没有讲义,手上不拿书,不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全听得懂。全喜欢听。全记得住。喜欢记笔记的同学都记啊记,心里是活蹦蹦的开心、明亮、充满专业希望,还有栀子花的香味。

刘先生喜欢这些久远故事中的谁,不喜欢谁,都直接说出,个性得很,也天真、幽默,眼中的老年光晕闪出一下的是孩子的笑。

每次下课,由东部校园往西部校园走,刚才的

先生们

梅子涵

课堂都被我们端在一路的话里,一直端进寝室和餐厅。

刘先生以前在别的大 学当过老师,也当过我们大学的系主任,但他后来是以讲师退休。学校一直劝他申请一下当教授,他摇摇手,不当了,不当了。

他穿布鞋,大步走路,身子笔挺,不东张西望。

后来的校园里不再有“不当了”“不当了”这样的精神和人了,刘先生的故事是一个结束。

张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名气很大,威望很大。站在他树下的人不少。他当系主任,待人都客客气气,绿荫般温和,给人提建议也是客客气气。

我那时多年轻,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论文答辩结束。经过二楼系里的走廊,他客客气气喊我,然后建议说,以后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应该肯定一些,

不要出现“可能的”字眼。

我竟然年轻嘴快,立即不同意,说,研究怎么可能都是肯定的,不是还有哥德巴赫猜想吗?

张先生说:“我只是建议,供你参考。”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的怒。

他身后正好跟着几个他的学生,也都是老师,每一个的资格都在我之上。集体都愣了,四射的惊讶。

离开走廊后,有两个分别找到我说,你怎么这样对张先生说话?

我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同意啊!”

过了两天我有些后悔了,也有些担心。

就问到了张先生家里的电话,犹豫着还是在晚上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张先生,对不起啊,我没礼貌,不懂事,顶撞了你,你别生我的气,你千万别生气啊!

张先生笑嘻嘻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学术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你不要有顾虑……后来,每次见到张先生,打招呼时心里都会有亲近的美好,他的学术弟子多,我是语言学专业之外的,但真正的先生,树荫都是一个大的蓬盖,我后来对人提起张先生,都是说“我们的张先生”,我会对人说起自己的年轻嘴硬少修养,说起打完电话后坐在灯下松弛的发呆,这不是一件大事,但我把它当成一件不小的事来说,因为一件事情在我心里撑开有多大就有多大,我还会对人说张先生喜欢喝的五加皮,我也专门买了喝过,它的颜色像玛瑙一样……

何先生一直研究中学语文,是语文教学的真名 家,住在校园的音乐新村里,我刚毕业时被分配了一间小小的宿舍房,在他家那幢小楼的对面,隔着一片空地,长着几棵树,站在窗口看得见他的进进出出,翩翩风度,像一个会走动的知识,像特别标准的语文。他独自走在路上也是有笑容的,没有人迎面走来,他却是彬彬有礼地走去,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像是他的世界形象。

他被称为大学里最像



都市蜜蜂

(油画)

刘亚安

教授的教授,是教授的经典模样。

有一个学期,我被安排在他的教研室参加政治学习,坐在旁边听大家说话,沐浴何先生的世界形象,我在写作里几乎不使用“沐浴”这样的词,嫌弃用得太多了,可是现在只想用它,因为那的确是标准准的沐浴,整个身心笔直端坐,眼前耳边尽是何先生的温良韵味。

在校园里看见他很知识很语文地走来,我都会站立

原地等着,不愿意错过了喊他一声,问候一下,他更是笑嘻嘻地迎着我,也喊我一声,他的上海口音和语气,很像上海菜里的这一小碟,那一小盘,他说话从不用大碟子的,永远不会铺满,像一篇篇编制得最细致、简明的课文,供人学习母语的基础和韵律,我偶尔问他一点语文上的事,他也都是最语文地告诉我,彬彬有礼一小碟,但是足够了。

徐先生一直研究文艺 学,是个谦谦知识人,温和得很,神情和语气里都含了笑,话语里多有上海话的“是吗”,说到文艺学上的话题,他每一句话都听得明白,明白得好看,那时,文艺学里已经流行比欧美更欧美,前现代还没有拎起脚跟,后现代脚尖已经伸进来,顶得前现代要赤脚逃开,我问起他,他说,哈哈,是这样的,读读书就知道了。我那时也年轻,也学了用脚尖拱一下脚跟,但是后来懂得

点徐先生的哈哈,也就哈哈着不想拱了。徐先生那样的书人,西方和中国的理论学得兼备,他曾经跟着上海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编了多年的权威教材,虽是有“时代性”,但是功夫扎实,自在严谨逻辑中。后来那位文艺理论家的儿子也进了大学,比我低两届,如我弟弟股和我来往,我领着他去见徐先生,换着公共汽车到了徐先生家,我指着问徐先生,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说出了理论家的名字,徐先生吃惊得眼圈红了,理论家已经去世十几年,徐先生喊着他儿子的名字:“新跃啊!”

新跃和我一起编着系里的学生刊物《文友》,徐先生当顾问,学生写的文学总是会热情不少,幼稚也不少,徐先生总是说,不错的,不错的,学文学的,写写文学,文学会学得更加有感觉的。

新跃也爱好写。

徐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红学家,我当知青时就总读到他的《红楼梦》文章,熟悉他的名字,但是这时他已经很少说《红楼梦》,他遇过磨难,正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年代写了《红楼梦》文章,以他的口才,温温稳稳的语气、节奏,足够的文艺理论修养,讲起来必然非常好看。

徐先生说理论,还有那些真正的先生们说学问,都不“高耸”。

新跃后来每次从美国回来都去看徐先生。

先生们都还在的,在我的文字间。

早年听过两句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前面一句好理解:大英雄用不着自吹自擂,也用不着别人吹喇叭抬轿子。无论威风凛凛,还是形同乞丐,都会让人尊敬。名士就好像复杂一些。首先“风流”就是个颇有歧义的词。搁在这里,最浅显的理解,应该是“风流倜傥”的意思,包括“气度非凡”,“器宇轩昂”,“睥睨万方”,“罗曼蒂克”,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温文尔雅或落拓不拘,手上握着烟斗或夹着雪茄,小口喝着茶或咖啡,吟一句“人间四月天”,又或是薄暮时分“由侍女扶着,吐半口血,在台阶上看秋海棠”,等等。

非此,就有些麻烦。

鲁迅当年应该算是名士了。他去饭店看望外国友人,仆役却不让他进门,嫌他没有派头。

以貌取人是世俗社会的通病,怪不得那仆役势利。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

某年访问一个北非国家,在宾馆大堂等车。一个瘸腿老人拄着树皮剥落的木棍向我们走来。他的穿着同他本人一样老旧,黧黑的脸露在一顶皱巴巴的鸭舌帽和一圈大毛巾之间。极厚的毛衣和棉袄满是灰尘,旅游鞋满是皴裂。当时我只穿着单薄的衬衫,在阳光下还是止不住出汗。但老人一说话,我就听出他的哮喘,这是许多老年人在冬季难以避免的痛苦。起先我以为他是随意进入宾馆的闲逛者,一点没有在意。

但我马上就知道了,他是该国作协为我们请来的导游。几乎是从一落座开始,老人便再也没有停止说话。在整个导游期间,他的厚嘴唇一直在不停地翕动,嘴角上一直挂着浓浓的白沫。他拄着木棍不停地爬上爬下,走来走去,给我们讲一幅幅壁画、一段段残垣、一座座建筑和废墟,不肯放过一块石头、一棵树甚至一片草,他恨不得让我们知道一切。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他毕竟是老人,嘴唇干裂,精力不支,不得不时而停下来喘口气,他叙述的热情就像横贯该国的大河流过灼热干燥的沙漠。一位老人,为了赚取报酬如此尽力地付出辛劳,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但是我们完成访问行程同他告别的时候,他坚决不收小费,只收下了我们随身带着的清凉油。他极高兴,连声感谢说,这对他的哮喘和风湿病一定有好处。

老人蹒跚着走出宾馆后,该国作协的秘书长告诉我们:老人是该国首都师范大学的退休校长。他的前任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故世后当地政府为那位作家建造了街心公园并在其中矗立了巨大的铜像。作为这样一位人物的继任者,老人是自豪的。

像许多知识者一样,老人是精神的崇尚者,清贫而富有。没有对这样一位老人表示足够的敬意,我心里一直后悔不迭。

但这样的后悔并不是最后一次。

几年后,我去到北欧一个国家,当地文化部门的官员带着一辆大巴来接,趁主宾寒暄的时间,司机一趟一趟地在接机大厅和停车场之间两头跑,把笨重的行李搬上中巴。他高大,壮硕,袖子挽得老高,手臂上满是浓密的体毛,脸色通红,一头大汗。到了宾馆,他又把行李一件件送进大堂。然后,礼貌地向大家摆了摆手,走出宾馆,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我请教接待官员才知道,他是教授,出版过许多著作,不久前从当地大学退休,这次是特地来做义工的。我看着绝尘而去的中巴,半天回不过神。

两位学者,生活在不同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国家,他们的人生姿态却是那么相似。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都应该是名士了。只是这样的“名士”恐怕很难跟前面所谓的“风流”沾边。

但我认为,两位学者的姿态,也是一种“风流”。这种“风流”就是他们天然的、自然的、坦然的普通人本色。

《庄子·天运》讲的东施效颦的故事众所周知。“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诮”(李渔《闲情偶记》)。人本来未必那么丑,因为“装”,反而丑了。看来,人还是本色最好。做人实实在在,别人自然敬重。风流不风流其实是无所谓的事。



夜光杯

弹乐器的老人笑眯眯(外二则)

许道军

在库车县一个农家大院里,一群人载歌载舞,自得其乐。有个老人坐在场边,不知道弹奏着什么乐器。他看着场中的少男少女,笑眯眯。

他不再年轻了;他的爱人在哪里?他不是欢乐的主角了,歌舞在继续。年轻多美好,他笑眯眯;爱情多美好,他笑眯眯;一切都是他们的,他笑眯眯。

我含着热泪看着他,恨不得手中也有一把乐器,为他演奏。

和田观看歌舞

少男少女在场中,翩翩起舞。老人们弹着乐器,高声歌唱。他们在歌颂牛羊,歌颂饕,歌颂爱情,歌颂往日时光。雪山好着呢,感谢;庄稼好着呢,感谢;老人好着呢,感谢;来日长着呢,感谢。

他们唱的是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却在不知不觉,加入了他们的合唱。我们一直用各自的语言,歌唱各自的生活。欢乐是一样,忧伤也是一样。

阿克苏的春天

每年春天,天山都有一次雪崩,绿色一泻千里。与河流一起冲下的,是芨芨草、骆驼刺、沙柳,是羊群和马匹。

它们是戈壁滩上散落的美玉。黄土铺在阳光下,四月铺在三月上,阿克苏铺在龟兹,库车这些古老的国度上。

散落的绿洲,是天山无拘无束的孩子,雪水耐心地将它们抚养。

风吹过的时候,挺立的白杨抬起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齐回望遥远的雪山,心存感激。

赛跑者冲到终点,无法立刻让自己停下来,这是牛顿定律的生动写照。比如我这个干了许多年刑警的人,即便在外旅游,眼睛犹携着怀疑的目光观察四周,想必也是惯性使然。

十多年前,拉普拉塔河畔,井字形街道花灯多彩,我们一行“驴友”徜徉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夜市。此地盛产羊毛皮货,店家各色皮货琳琅满目,价钱还要比国内便宜很多。

大半辈子起居于“两点一线”生活,平素也懒得陪太太逛商店,日常生活用品购置悉由她一手打理,简简单单的买东西竟成了我的软肋。出访前,太太不担心我在外的安全,却反复叮咛,在外千万勿要买东西,因为每回出访时的“殷勤”都换回“奚落”。记得那次在芝加哥为太太买了一件白色羊绒大衣,大衣肥硕,回家,太太裹于身上活脱脱一个慵懒的北极熊,好生讨来没趣。

我们来到一家私家皮货店,但见游客攒动,围在货架旁争相抚摸柔软

的貂皮和精致的皮革,啧啧眼馋间,令人涌起购物的冲动,想必太太在场,定然心花怒放。尽管嗔怪,也甭管太太的嘱咐,为她买一件当地的特产,表达爱意,总是做男人的担当。我特意挑选了一件色调素雅的手工羊毛衫,为太太买东西,重情不重价,何况才两百美金。

出访团里有一位首长,我们都称他“司令”,浓眉大眼,一等一的男人,走到哪里都身板挺直,置身商店不像别人那般放松愉悦,觉得货架上那些五花八色的商品碍眼,杵在一旁,目光仿佛失却了往日检阅部队时才有的神色。

我凑跟前逗他:“司令,不想买点东西送太太?”

“嘿,倒是提醒了我,得买点礼物打点同事。”司令昂起脖子,朝我扫来征询的眼色:“你给参谋参谋,我没买礼品的经验,买啥好呢?”真叫和尚遇

夜市“英雄”

戴民

见吃素的,彼此同路人,司令一时把我问蒙了。还是随团翻译替我解围,说本地的小件皮革票夹颇有特色,价廉物美,不妨作为礼物送人。

司令连连称好。翻译呼来店主,替客人推荐商品。女店主鼻尖唇厚,一双眉目处在九点一刻,欠身引导客人。皮革票夹柜前,司令也不挑拣,取了一摞票夹,随女店主结账。

眼看买家爽快利落,女店主总算泛起笑意,接过司令递过的几百美金,数了数,返身进入身后一间内室。半晌,女店主匆匆来到柜台,将几张百元美金摊于台面,眼直冲司令,嘴里捣鼓一通西班牙语。司令怔在原地,拿眼望翻译,翻译告诉司令,店主说你这美金是假钞。

司令闻听顿时面色潮红,像是受到羞辱,气不打一处来:“我这美金是打国内银行兑换的,咋能有假?”说罢,欲探身拿钱甄别。

“且慢!”我下意识按住司令。转

身朝翻译努嘴,让他问店主,这钱是否司令当面点给她的?女店主不假思索,点头称是。我说行了,叫翻译告知店主,让她报警。

那女人犹疑片刻,神情尴尬地堆起苦笑,抬起双手,喃喃嚷嚷:“ok,ok!”,满脸猥琐,悻悻收了钱,结账交货。

司令直直看我,我忙说:“司令啊,方才你若用手去甄别钱币,留下你的指纹,事情就说不清啦!”司令恍然而悟。

领队是我单位的顶头上司,一旁冲司令揶揄道:“咋样?我带的兵还中用吧?”我不好意思说道:“都是职业病犯的,惯性使的!”

给太太买的羊毛衫,穿了一回,洗过后,陡然缩了大半,又遭太太瞋目。看来,买不来太太喜欢的东西也是我的“惯性”。

十日谈

异地首夜

责编:刘芳

“日出”的剧本突然变了,请看明日本栏。